

新加坡国宝诗人

潘受

■ 徐持庆
 著

暨南国学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加坡国宝诗人

潘受

■ 徐持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暨南国学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 / 徐持庆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5004-6317-7

I. 新… II. 徐… III. ①潘受—人物评论②潘受—诗歌—文学评论 IV. K833.395.6 I339.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7923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弓禾碧工作室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625

插 页 2

字 数 191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徐持庆 男，马来西亚籍华裔公民。祖籍广东南海，广州暨南大学文学硕士。

曾任马来西亚怡保山城诗社社长、马来西亚诗词研究总会副会长。现任全球汉诗总会常务理事。

曾出版近体诗词集《敲梦轩诗稿第一辑》（1997年）及《敲梦轩诗稿第二辑》（2002年）。

责任编辑：曲弘梅

封面设计：



GONGHEBEI

暨南国学丛书序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 1907 年初在南京创办的暨南学堂。其诞生是出于华侨教育的迫切需要。

我国古代不乏在文化和经贸上的对外交流，汉、唐、宋三朝尤甚。相比之下，明代虽有郑和下西洋，清康熙帝也对外来文化怀有很大的兴趣，但总的来说，这两朝多处于海禁时期。直到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大清朝封闭的国门，自此，海禁大开。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东南亚和美洲的开拓，我国东南沿海的穷苦人民也因迫于生计而出国谋生，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不少政治流亡者流落到了东南亚，使得南洋群岛的华人大增。在世界风潮和国内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海外侨胞的近代教育也为之兴起。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改变了过去私塾义学的办学模式，相继办起了一批新式学堂。但由于地处南洋的此类学堂多缺乏师资和教材，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在华侨中普遍出现了回国升学的愿望。

1905 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员前往爪哇和新加坡等地视察华侨教育，1906 年，清政府学部再度派人到南洋调查学务，年底，电咨两江总督端方关于在南京办理爪哇侨生归国读书事，得到了端方的肯定。端方向朝廷上奏折，提出了南洋各岛和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侨民如有愿送子弟来宁就学，“并当一律收取，

以宏教泽而系侨情”。清政府批准了这一奏折，招收侨生的暨南学堂遂于南京开始筹办。1907年3月，国内第一所华侨学校在南京鼓楼薛家巷诞生，因学生多来自南洋，故取《尚书·禹贡》中语：“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名之为“暨南学堂”。

暨南学堂在辛亥革命中停办，1918年又在南京薛家巷复校，分设师范、商业、补习诸科和小学。因侨校所负“声教南暨”的使命，遂据孔子所说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立下了“忠信笃敬”的校训。在经过了商科迁沪及与东南大学合设上海商科大学之后，暨南迁校至上海近郊的真如，使得在此地的1923年到1937年，成为暨南校史上的辉煌时期。1927年郑洪年被任命为校长，提出了三部六院的华侨最高学府发展目标，暨南学校得以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经历过南京创建、真如发展、迁址孤岛和福建建阳以及战后回沪等时期，在新中国建国后，由于在校侨生甚少，加以物质条件十分困难，遂于1949年9月合并入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回国求学的华侨学生逐年增多，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于1958年在广州重建，陶铸同志兼任校长。经近10年的努力，暨大已发展成一所粗具规模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重灾区，被迫于1970年撤销，校址被占，各系科分别并入其他各校。197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并进行重点扶植，自此，暨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多年来，学校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教学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重新恢复了华侨最高学府的地位。

在暨南大学迄今98年的历史中，虽经历了三落三起的曲折，也因战争和政治的诸多原因，使“系侨情”的宗旨受到了干扰，

但就总体而言，始终是本着“宏教泽”的目的而不忘“声教南暨”的。从办学之始，就是为了适应华侨眷恋乡土、挚爱祖国文化之需，而将为华侨子弟开设祖国语言、文化等课程置于首位。在1927年郑洪年校长制定的《国立暨南大学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办学目的、方针是将暨南学校“扩充为一完善之大学”，“以期从质量上完成华侨之最高学府。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曾短暂代理校长的沈鹏飞也认为“文学院文史课程，为发扬我国故有文化之主要学问”。因此，对暨南大学这一侨校而言，传统的“国学”具有本土之学与“声教”“南暨”的特殊的、双重的意义。而在暨南大学的历史上，国学也确实曾有过很高的地位和较长时期的辉煌。

1927年秋，暨南大学的中国语文学系成立，开始招收新生，两年以后，文学院成立，下设中国语文学、外国语文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四系。文学院院长为著名学者陈钟凡，中国语文学系主任为夏丏尊，后由陈钟凡兼任，此后又由陈柱尊继任中文系主任。外国语文学系主任为叶公超，继任主任梁实秋，历史社会学系主任黄凌霜，继任主任许德珩。在文学院任教的著名学者有李达、邓初民、钱亦石、杨公达、洪深、夏衍、张君勱、张世禄、沈从文、徐中舒、陆侃如、冯沅君等。即使是中学部，也有任国文教师的曹聚仁、汪静之，任英文教师的周谷城、顾仲彝、许国璋等著名学者。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曾先后担任暨大文学院院长有陈钟凡、郑振铎、许杰、刘大杰、吴文祺等著名教授，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有夏丏尊、陈钟凡、陈柱尊、龙沐勋、张世禄、郑振铎、许杰、刘大杰、郝冕衡等，担任历史学系（或历史社会学系、历史地理学系）主任的有黄凌霜、许德珩、

张凤、周谷城、周予同、丁山等知名学者。1928年陈钟凡任中文系主任时，除自任散文、文学史教学外，还有教授陈柱教诗、古方言、专家文，刘赧教诗、《说文》、音韵，张凤教古文字学，兼任讲师陆侃如教诗史、诗论，郑振铎教小说，饶孟侃教文学概论、文法，讲师冯淑兰教词和词史，张世禄教语音学，龙沐勋、王家吉、马承钩教各体文，徐中舒教各体文和古文字学。仅此已可知当时暨大中文系教师阵容之盛。

在郑振铎任文学院院长时，第一年度（1935—1936）全力整理课程，然后努力充实中文、外文、史地诸系的图书资料，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当时文学院还创办了三种学术刊物：《文史季刊》、《地理资料》和《中国戏剧》。校长何炳松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通史新义》、《历史教学法》和《近世欧洲史》等，他亲自组织编纂《中国通史》教材，自任委员，另有郑振铎、周予同、陈高儒、周谷城等为委员，由周谷城教授编著成书，问世后，深得好评，被很多大学用作教材，一再翻印，后来还在港澳、台湾和国外流行。暨大很重视在学生中开展学术活动，其中不少都属于国学范畴，如鲁迅在1927年和1929年曾三次被邀到暨大演讲，其中第三次所讲的是《离骚与反离骚》。中文系在1935年10月到11月间，曾先后举行两次讨论会，第一次讨论“文学之遗产”，第二次讨论“文学之趋势”。20世纪30年代，龙沐勋在暨南大学创立读书会，每天早上领着三四十个男女学生朗诵诗词，领会声情，使学生的诗词创作一时甚盛。龙沐勋又在叶恭绰等人的赞助下，创办《词学季刊》，在1933—1936年，前后出版11期，对词学研究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当时的暨南园不仅学会和刊物众多，而且很重视对文艺遗产的学习、继承，如文学院院长陈钟凡为能使学生了解古音韵的奥秘，在1933年请昆曲名家俞振飞到校讲学，使得昆曲也在

校园中流传开来。即使暨大经历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战火，学校遭受到不小损失，一度人员分散各地，但1936年《东方杂志》1月号刊载的黎照寰《青年努力新趋势》一文，仍将暨大与其他著名高校并提，在论述了全国教育界的形势后说：“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武昌的武汉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都像春花怒放，成绩斐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同年的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暨南大学地处战区，被夷为瓦砾场。在迁址租界后，“孤岛”时期的暨大，学术活动仍在进行。《暨大丛刊》持续编纂，十巨册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参考了一百多种图书资料，经四年编纂，于1940年出版，成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参考书。继《中国通史》出版后，周谷城又在1939年出版了《中国政治史》，郑振铎出版了《中国版画史》。1940年，暨大创办《学林》月刊，所发表的如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的新史学》、吴文祺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都是带总结性的重要论文。即使在南迁福建建阳的数年中，在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也未中断学术研究。抗战胜利后，复员上海，文学院的著名教授及所讲授的课程就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小说戏剧选，吴文祺的文字学、音韵学和修辞学，许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李笠、丁山的文字学，钱钟书的欧美名著选和文学批评，谭其骧的历史地理等。

在暨南大学复校广州后，文史两系分别由文艺理论家萧殷和中外关系史家朱杰勤任系主任。即使来自“左”的思潮干扰不断，学术研究也没有停止，如中文系在民间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上就很有成绩，历史系则完成了《番禺史志》的修改定稿。黄轶球教授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越南汉诗的卓越成就》的重要论文，张天翼、陈残云、秦牧等著名作家都曾到暨大作报

告或讲课。但由于大环境的关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原则的确立，再加以暨大作为侨校已变更了早先的办学宗旨，传统意义的“国学”研究，在暨大 1958—1966 年的八年历史中，是难以讳言的中衰时期。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劫难后，暨南大学在 1978 年复办并招生，著名作家秦牧和文艺学家饶芃子教授先后任中文系主任，方言学家詹伯慧教授在 80 年代曾任文学院院长。新时期以来，暨大的古代文学学科虽无在上海真如时期那样的诸多大家，但也出现了一批名师和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老一辈学者汤肇民教授的唐宋文学研究，老诗人陈芦荻的刘禹锡研究，艾治平教授和郑孟彤教授的唐宋文学研究，李文初教授的汉魏六朝文学及陶渊明研究，洪柏昭教授的元曲和唐宋文学研究，王景霓教授的杜牧研究，都有较大影响，其中艾治平教授的《古典诗词艺术探幽》，郑孟彤教授的《唐宋诗词赏析》都在 20 年前获得了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至今，八十高龄的艾治平教授仍著书不辍，其中涉及古代诗词的著作就有 10 种之多，堪称成果累累，其他的老师也多是退而不休，仍在持续着自己的学术研究。

近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暨南大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学校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的办学方向，承担起培养海外高层人才的特殊任务，并成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在办学水平全面提高，科研能力节节上升的同时，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学科成员不仅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而且建立起了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现在暨大从事古代文学和文献教学与科研的十多名主要成员中，只有两人是硕士，其余都是文学博士或从事过博士后研究，近 90% 的成员年龄在 50 岁以下，充满了朝气和锐气。暨南大学古代文学学科自 1983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以来，经两代人的努力，20 年后终于有所突破，在

去年获得批准，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建起古代文学博士点和古代文献硕士点，并在今年招收了第一届博士生，标志着学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现在的暨大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科，主要有四个研究方向：中国古代韵文学，儒释道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科学。不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也出现了一批较有质量和影响的成果。其中韵文学方向以词学研究为主，艾治平教授的《婉约词派的流变》、《清词论说》、《花间词艺术》，魏中林的《词综注》，赵维江的《金元词论稿》和我本人的《唐宋词美学》、《中国词学批评史》（合著）等，多具有原创性。诗学研究有李文初教授等人合著的《中国山水诗史》和《中国山水文化》，李文初以诗歌为主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和魏中林的《清代诗学与中国文化》，徐国荣的《中古感伤文学原论》，也是颇具首创性的著作。在儒释道与中国古代文学方向上，蒋述卓从事研究较早，其完成于80年代的博士论文《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被收入季羨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丛书出版，还有《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在文化的关照下》、《宗教艺术论》等著作，此外，刘绍瑾的《庄子与中国美学》、《复古与复元古》，张海沙的《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分别论述了庄学、儒学与禅宗对古代美学和文学的影响，史小军的《复古与新变——明代文人心态史》，苏桂宁的《宗法伦理精神与中国诗学》，也属于该方向的著作。古代叙事文学有程国赋的《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唐代小说与中古文化》和《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等。古代文学史科学有张玉春的《史记版本研究》等，以及集体编著的《宋代文学理论集成》、《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军事散文精选》、《中国历代小品选》、《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

等。在以上四个方向以外，我本人又有交叉性、边缘性、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如专著《有声画与无声诗》、《中国绘画思想史》、《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和《学者闻一多》（合著）等。

由于近年来对科研的提倡和重视，在高校“211工程”建设中，从教育部、广东省，直到学校，都对学科建设、发展给予了较大的投入、支持，更促使我们不得不努力，新的研究成果也随之产生。为此，我们据本学科点成员近年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研究课题，编辑了这套丛书，名之为《暨南国学丛书》，计有：徐国荣的《玄学和诗学》，张海沙的《曹溪一滴水——岭南禅学与诗学》，聂巧平的《宋代杜诗学研究》，史小军的《明代七子派研究》，王进驹的《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研究》，全秋菊的《古代荒诞剧研究》，陆勇强的《陈维崧年谱》，魏中林的《近代爱国诗潮研究》，赵维江的《古代词的形式嬗变》，程国赋的《三言二拍传播研究》，张世君的《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徐持庆的《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以及我的《唐宋词艺术发展史》。其中或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经多年打磨后终与读者见面，或为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古委会、教育部、广东省、省高教厅立项的科研项目。从书名可见，它们仍在四个研究方向之内，而就个人而言，则标志着自己研究范围的延伸、扩大和合理发展，对集体来说，则形成了覆盖面较广的研究成果，在多具原创性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因各人立题和写作的时间不同，篇幅大小有异，自然完成也有先后，丛书打算在两年多内陆续出版。可以相信，在这十余种著作出齐后，暨大古代文学和文献的研究也将达到新的水平。

我们这群人，经历不同，长幼有别，来到暨南大学的时间先后有异，治学的兴趣和方向更是有很大差别，但由于今日都在暨南园内，所作以集体的面目出现，并以“暨南”来命名是很自

然的事。然而，其义又非止于此，以“暨南”为名，既起“名片”作用，又意在继承和发扬暨南大学近百年的优良传统，不忘我们今日作为暨南人所应继续的“声教讫于四海”之历史责任。虽古代文学与文献仅是国学研究中的一类，难以尽赅传统国学的全部，但无疑又是国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辨析命名同时，我们相信在属于我们近邻的史学和其他学科研究上，暨南大学也定会出现许多新成果，如果这样，我们很愿意为展示暨南国学研究的集体成果而先走一步。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无论是暨南，还是国学，也同样担负着虽“旧邦”而“维新”的历史使命。我们既然跨越了世纪，当然也要努力造就和见证未来历史崭新的一页，在以本丛书来续写暨大国学研究的历史，迎接暨大百年校庆的同时，我们也将满怀豪情，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

邓乔彬

2004年9月26日于暨南大学明湖苑临风轩

序一

海外华文诗歌研究的新视点

——《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序

饶芃子

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又一批的海外学子从世界各地来到暨南大学这所国立华侨最高学府学习，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在他们心灵深处，都有一种对自身民族精神家园的寻找和认同。2006年毕业于暨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马来西亚硕士生徐持庆，在这方面是极具代表性的。徐持庆进入暨大攻读硕士学位时已63岁，而且是马来西亚知名的诗人，有《敲梦轩诗稿》等诗刊问世，也没有任何职业和生存上的压力。他来暨大学习，只是想圆他数十年心中的一个“梦”。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来这里学正宗的中华文化”。这是一个多么素朴而又深邃的“梦”！可见，数十年来，他是一直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岁月匆匆，转眼他已学有所成。三年来，他在赵维江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不但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位的学习和研究计划，还在此基础上，撰写出《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书稿，此书视角独特，颇具创新意义，令我读了，有一种由衷的惊喜！

潘受是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地区一位有广泛影响的文化名人，他热爱文化工作，毕生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为新加坡的文化繁

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新加坡华人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创作的古体诗词艺术造诣高，在新、马地区诗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以往国内学者对新加坡华文诗歌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新加坡的华文新诗，对当代华人诗人创作的古体诗词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而潘受的诗作是古体诗词，至今没有人对他的诗作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徐持庆以此为题，结合潘受的丰富人生，对其创作的古体诗歌作全景式的透视，从内容的广度到艺术的特色以及诗歌的类别，都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评价，填补了新加坡华文诗歌研究上的一个空白，也为国内海外华文诗歌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点。

正如大家所知，在中国本土，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传统的古体诗词形式逐渐被文学主流所疏远，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古体的诗词形式更是被边缘化了。但是，在世界各国的华人文化圈里，特别是在华侨、华人比较集中的东南亚地区，古体诗词却一直是华族文化人言志纪行最得力的工具，诗词创作在许多时候还和他们在异域他乡创业和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不但这种诗词写作的传统始终未曾间断，在他们中间还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诗人，留下了丰富的作品。这些诗词作品是属于他们居住国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延伸，是海外华文文学学者应当去关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记得我在2006年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说过，目前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有几个新的视点值得我们去关注：1. 华族文化向外移动后对母体文化创造性重建的问题；2. 探讨其在向外移动后某些文学的共相问题；3. 进一步发现和阐释海外华文文学的世界性意义。海外华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是他们在海外移民生活的基础上对母体传统文

学形式的一种运用，由于作者创作时的身份、心态、经历已不同于本土的诗人，因而也具有了“对母体文化创造性重建”的意义和某种世界文学的特性。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以传统文学形式表达出来的海外华人的各种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

在历史上，由于中华文化的辐射力和汉语文学的艺术魅力，中国周边的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不乏用汉语写作诗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属于广义的海外华文文学范畴。这种文学现象，近年已引起学界的注意，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近代以来海外华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却尚未得到学者们应有的关注，没有系统的规模化的研究。无疑，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新领域，也是一个新的学术拓展机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徐持庆所撰写的《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是一本有创意且能启人诗思的书。徐持庆的书稿将于近期出版，他自大马飞函索序，作为一个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耕耘多年的学者，我感到很欣慰，也乐意为这一海外华文文学的新成果鼓且呼。匆匆书此，是为序。

2007年2月13日

（按：作者为暨南大学资深教授，暨南大学前副校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